



中國詩學

黃永武 著

考据篇

中國詩學 黃永武 著
考据篇 篇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诗学·考据篇 / 黄永武著. --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5104-3365-8

I. ①中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诗歌研究—中国 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18465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,
限于中国大陆地区销售。

中国诗学·考据篇

作 者: 黄永武

责任编辑: 郑利强 张越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10×1000 1/16

字数: 290 千字 印张: 18

版次: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3365-8

定价: 3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新增本序

考据重在科学性的求真，新增本《中国诗学·考据篇》是进入诗国花园第一道大门的钥匙。想去诗国履香赏花，当然期待履的是真香、赏的是真花，考据便是巡回花畦前认证的方式与保障。

然而对现代年轻朋友来说，“考据”两字是票房毒药，一听考据，无不掩耳回避，甚至可能大叫：“我的妈呀，可怕死了！”

现代青年为什么会视“考据”为可畏呢？因为年轻人很怕见甲在说乙错了，乙又说甲不对，丙再来说甲乙都有误，好不容易读书，只爱简明实用，谁爱排难解纷？冲突虽易引起注意，但年轻读者不易达到作者的学术高度，无从判别甲乙丙各作者间的高度参差，如何审辨谁对谁错呢？读诗既像优游赏花，考据则引来纷争聚讼，赏花前先来一番纷争聚讼，岂不是大煞风景？无端吹皱一池春水，关卿何事？年轻朋友没啥兴致，只想一概从略。

再则现代年轻朋友对文学诗句的涉猎爱好，已偏向娱乐，并不要求严谨与专门，并不想成为诗文的专家达人，既不像研究怎样饮食可以最长命，又不像研究怎样理财可以最划算，津津计较一字一句做什么？

例如有人说刘长卿的《至鸚鵡洲夕望》诗：“孤城背岭寒吹角，独戍临江夜泊船。”其中“独戍”应该写为“独树”，“独树”是当地渡头名“独树口”的简称，“孤城”与“独树”才对仗得精准些。后人搞不清楚地名，方改为“独戍”。如此的探究对年轻读者来说，根本无关痛痒，觉得可有可无，改不改又怎样？赏诗似乎不求甚解还比较轻松些，巴着一字一句去切实考据，多累呀！



除了上述“辨不清谁是谁非”及“不求甚解、只求娱乐”二点之外，将考据视为畏途，最大的影响是大时代大环境的价值导向所带来的牵引鼓铸。

很奇妙的，凡是社会风俗最淳美的年代便重视实事求是的考据。东汉风俗淳美，考据大师领一代风骚，直至东汉末年，问字不休的贾逵、五经无双的许慎、绛帐校书的马融、草瓢书带的郑玄……这些大儒的考据成绩合组成巍巍千古的“汉学”，今日“汉学”两字仍是“中国学术”的代名词。

清代的“乾嘉盛世”风俗淳美，考据家又成为“读书人”中最顶尖杰出的精英，以“复兴汉学”为职志，《汉学师承记》里所录的数百家，个个是笺注、疏证、校勘、辑佚、辨伪的博学鸿儒，谁能精校精注一部书，便是名传四海的大学问家，其他写文辞、讲道学者鲜能望其项背，考据的复兴等于是汉学的复兴。

即使是讲究思想鼎新的北宋，由于风俗淳美务实，所刻书册，一笔不苟，对于简编零落、字书讹舛，校正极为认真，书的补完校定、镂版刊行，非但动员了国子监、太学、辟雍官、书库官，还要由礼部覆行抽稿，闻奏于皇帝呢！此种搜罗亡佚、细心雠校、商榷是非、务求精良的考据态度，当然与整个社会有笃实认真、明辨是非的淳美风尚息息相关。试看北宋王安石要编《唐百家诗选》，特往宋次道家中作客，住了长时间，因为宋次道家的藏书，都是经过三五遍校勘的定本，像王安石这般满脑子革新思新的人，选唐诗时竟然如此注重考据呢！

单就近年的学风来说，二十世纪五十、六十年代，台湾民风单纯务实，黑是黑，白是白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当时学界的考据风气颇浓，研究诗的学者，讲求如何笺注、如何校勘，一时著作如林。而彼时大陆正搞“大跃进”，上海博物馆从废铜烂铁中抢救历史文物即达数万件。接着又掀“文革”，文物考古的学报居然有几期是由“女工”带头主编的，考据受到蔑视，莫此为甚。

然而至八十、九十年代，大陆学界噩梦初醒，随着经济开放，生活初

安，二十年来笺证疏解的著作，渐见壮硕充实。而反观台湾学风日趋浮浅，忘本尚华，去道弥远，志在苟得，鲜植根柢，只争知名度，只讲包装行销，妄训浪批，以嘴皮决黑白，考据求是的风气一落千丈，错字连篇，无人闻问。试翻阅本书中《研究中国古典诗的重要书目》，海峡两岸考据风尚的消长态势，无不憬然洞见。

在大陆学界的崛起之中，当年台湾在考据上的努力成就已逐日被并吞遮掩，我的《考据篇》必须为台湾此段研究成果留下许多人早期耕耘的纪录，并期待台湾新当政者上台，能一刷过去口水当政者泯灭真相、信口雌黄的轻薄陋习，风清气美，进而扭转避实蹈虚的学风，多些实学实证的务本著作。

整个大环境笃实务本的风尚足以纠正读者只求娱乐不求本源的习气，读者如果有了追根究柢的务实精神，自然就能增进判别谁是谁非的衡量高度。想进学术殿堂的门庭，非先具备考据的知识不可。就像木匠需要锯子、刨刀、斧头、凿子，少一不可，若用斧头代替刨刀，费力百倍也难以成器。考据也一样，目录、版本、校勘、辨伪、辑佚，乃至文字、声韵、训诂也少一不可，譬若不据善本去校勘，不晓训诂去臆断，也费力十倍难以奏功。

这新增本《中国诗学·考据篇》，志在倡导治学者笃实务本的方策，一步一桩，扎扎实实，厚培根基，毋望速成，不指鹿为马，不诡辩欺人，不穿凿蔓引，不标榜虚声，一切以稽核求真为依归。为使考据不枯燥乏味，新增《诗歌考据趣例》一章，以启导青年朋友。务必使诗国的花圃，赏花是真花，闻香是真香。

黄永武

2008年5月于加拿大

自序——谈诗的研究途径

热爱诗歌是中华民族的特色，世上没有一个民族，是那样喜欢以诗歌作为生活细节的饰物。每当你登堂入室，望见楹联画轴，处处有诗；而所用的一器一皿，类如夏扇冬壶，往往有诗。诗，实际上已成为我们民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。

也许正因为诗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所以“习用而不察”，我们民族似乎喜欢“感性”地涵泳在诗中，对于诗“知性”方面的研究考据工作，一直滞留在零零星星而缺乏体系的层次，鲜有进展。

近岁以来，由于研究诗歌的资料大量翻印，研究诗歌的学者先后崛起，承载诗歌的文物不断出土，一面发扬旧有的考据方法，一面引进西洋的批评理论，这古今中西的巨大汇流，激起了新的研究热潮，一时颇有成为“显学”的趋势。

在这股热潮中，可观的成绩固然不少，但若干研究方法上的偏差也不是没有，我以为有八种研究的途径，我们常走，而却是值得自我检讨的：

譬如将一首前人的小诗，作漫无边际的“欣赏”，虽然完成了我们自己的“想象驰骋”，但对原作者来说，可能很感“意外”，对读者来说也是一种“浪费”，这样可能犯了“蔓衍”的偏差。

又譬如有些诗篇是有问题的，甚至早已被判定是伪诗，像蔡文姬的《胡笳十八拍》，卓文君的《白头吟》等，而我们还在把它当作美谈，这样可能犯了“盲从”的偏差。

又如我们牵合殷墟卜辞的对贞文字，解释作诗歌和声的起源，牵合小说中诸葛亮的造型，以为东坡词中的“羽扇纶巾”不是周瑜，这样可能犯



了“枉牵”的偏差。

又如我们抄抄旧注、翻翻辞典，写些与前人重复的见解，作些空洞的注脚或无谓的分类，名为整理，实则拼凑抄袭，这样可能犯了“贩抄”的偏差。

又我们若只对诗中某事某物，作狭角度的观察研究，名为“小题大做”，实则“得其小而遗其大”，最后归纳出一大堆无用的结论，这样可能犯了“管窥”的偏差。

又我们如对古典诗学理论，浅尝辄止，满纸都是陋儒塾师的看法，老生常谈，全无新意，反而认为“诗道至此足矣，其余概不足观”，这样可能犯了“泛论”的偏差。

又若喜欢从思想的分析去看诗人，诗人一谈到乐天，我们就把他归之于道家；一提及仁爱，就归之于儒家。把诗人看作思想家的鼓吹仗卫，把集部的作品贬为子部的支流，这样可能犯了“附庸”的偏差。

又如我们运用西方心理分析派的道理，见诗人一谈到“花”，就是“性器”的象征，甚至将“花径不曾缘客扫，蓬门今始为君开”、“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”，原本是开玩笑的人故意想入非非、加以曲解的诗句，也认真作心理分析的证据，并作东西文学的比较，这样可能犯了“乱比”的偏差。

举述这些偏差来一一省察，目的不在排斥某些研究成果，而是希望能积极地汇聚学者的精力，作更有效的投资，我们不希望有门户之见，但不能不知门径的辨别。下面我想先谈从考据方面去研究古典诗，有哪些途径可以去继续垦拓，下列有十个项目，如能潜心致力，一一完成，便奠定了研究中国古典诗的基础，诗的研究前途，才有无比美好的远景。这十条途径，是从校勘辑佚的点点滴滴，汇向全面性的、整体性的、建立诗论与诗史的汪洋大海：

一、诗句异字的精细校勘

诗人在创作时，字字推敲，句句争胜，一字也不肯轻易放过，吟哦停当，不容有误。相传有不少替人改诗的故事，只更改诗中的一个字，使得诗的情韵顿别，即号为“一字师”，可见诗篇往往是“以一字见工拙”，一字出入，关系甚大。

诗既难以容忍有错字，但由于诗篇辗转抄刻，行楷草书，往往误认，传至后代，异字不少，如不能予以校正，往往枉耗诗人们匠心锤炼的功夫。所以如何汇集善本，有计划地精细校勘各家的诗，乃是诗歌研究者首须进行的工作。

诗因版本不同而有异文，有异文就影响内容。譬如李白的《将进酒》诗，明代刊本有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句，清人王琦在校勘时，已发现有作“天生我身必有财”及“天生吾徒有俊材”、“天生我材必有开”等异文，今见敦煌发现的唐人手抄残卷，诗题作《惜罇空》，句子作“天生吾徒有俊才”。李白的诗，在唐代传抄时最为普及，唐人的写本，也最接近作者的年代，理应较为可信。若敦煌本作“天生吾徒有俊才”是对的，那这句诗应解作“天才挥洒”者的“自负”，而不应解作“意气凌云”的“乐观进取”。才差了几个字，解诗者便不能据此说李白能“把握当下的确实性及人格价值”。可见许多分析或判断，如果没有精确的校勘作基础，往往会有立说不稳的危险。

又如高适的《信安王幕府》诗，四部丛刊本有“波际隐朝鲜”句，今见敦煌残卷本作“波际指朝鲜”，这“指”字用动态来展示，随着这“指”的动作，使近处的人到远处的景物，有了空间的深度感。而波际的朝鲜，顺着手指的动作方向，隐约地呈现出来，所以这“指”字，已该括了“隐”的意思，如果不是“隐约难明”，就用不着劳神去“指”了，可见用“指”字比直用“隐”字要有味得多。



又如王昌龄的《长信秋》词，明代刊本有“梦见君王觉后疑”句，敦煌残卷本作“梦见君王怯复疑”，大概是因为“复”字与“后”字行书极相似，“复”误成了“后”，“怯后疑”不通顺，又改成“觉后疑”，“觉后疑”三字固然也很有情趣，但不如“怯复疑”，因为梦见了往日的君王，醒来半怯半疑，这半怯半疑已该括了“觉后”的意思，且将奚落在冷宫中那种畏缩失望的弃妇心情，描绘得传神极了。

又如白居易的《题遗爱寺前溪松》，“暑天风槭槭，晴夜露凄凄”，平冈武夫所见日本旧抄，“槭槭”作“瑟瑟”、“露”字作“雨”。考彭叔夏校《文苑英华》，见当时宋本或作“瑟瑟”、作“雨”，正与日本旧抄本同。又考白居易另有《松声》诗：“萧寥发为声，半夜明月前。寒山飒飒雨，秋琴泠泠弦。一闻涤炎暑，再听破昏烦。”正谓炎暑月夜的松声，犹如寒雨飒飒。故意用矛盾的语法，与前诗构思正同，足证旧抄本的雨字是可信的，“晴夜雨凄凄”比“晴夜露凄凄”更能表现松涛的韵致。

以上这些例子，足以说明校勘的功用，无论是作者思想的探讨、作品美感的分析、文字结构的层次、内容意旨的研求，都要仰仗于精确的校勘。校勘不仅要校出异文，主要是能判定异文的正误。

二、名家佚诗的彻底搜辑

我国历代有兵燹祸乱，书籍的散亡率甚高。尤其是怡情悦性的诗篇，当初结集时，未必是作者自定的手稿，往往靠后人代为搜辑，搜辑时已有部分散失，传至后代，诗人既多，篇章不少，传抄为难，后人选录部分眷抄，入选者少，遗落者多，使作品或传或不传，更形成了严重的散佚现象。

即以敦煌发现的唐人诗选残卷（伯二五六七号）看来，除李白的诗全存外，其中所选李昂诗三首，两首已不见于本集；王昌龄诗共七首，有两首已不见于本集；邱为诗六首，五首已不见于本集；陶翰诗三首，两首已不见于本集；高适诗两首，今《高常侍集》中一存一佚，单从这张残卷看

来，名家诗篇散佚率之高已不难想见。

名家诗篇的散佚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损失，吾人在惋惜慨叹之余，必须兴起歆慕追求之心，要设法将亡佚的名作尽可能搜辑出来，这自然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。搜辑佚诗的途径约有下列数端：

残卷

如英伦所藏敦煌残卷中有韦庄的《秦妇吟》诗，不见于《韦端己诗集》，王国维氏已加搜辑考证；巴黎所藏敦煌残卷中有《高适诗集》残卷，有佚诗三首，阮廷瑜已加搜辑。至1985年吴肃森有《敦煌残卷高适佚诗初探》，孙钦善有《高适集校敦煌残卷记》，施淑婷《敦煌写本高适诗研究》列佚诗八首。又敦煌斯五五五号卷背有李岩《咏物》诗十首，均不见于《全唐诗》，我已介绍于《敦煌的唐诗续编》中，而1982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《全唐诗外编》中，收王重民《补全唐诗》及《敦煌唐人诗集残卷》，约有唐人佚诗一百八十首。另有《补全唐诗拾遗》约一百首尚未收入。诸如此类，未曾收辑的部分尚多，亟待梳理。

选本

如唐人韦毅所选的《才调集》中，有白居易的《江南赠萧十九》诗、贾岛的《赠杜驸马》诗，都出乎本集之外；宋人王安石的《唐百家诗选》，有高适的《途中酬李少府赠别之作》等，不见于本集，另有十几首诗不见于各家本集；元人方回的《瀛奎律髓》，也时有诗篇出于本集之外，如顾非熊的《送李骑曹之武宁》诗，《全唐诗》及《全唐诗逸》均失收。凡选本中可信的篇章，本集不载，皆可辑补。

诗话

在《全唐诗》的编辑过程中，已利用许多诗话笔记，搜辑了不少佚诗或残句。厉鹗的《宋诗纪事》，更从诗话、笔记、府志、题跋、碑石中，辑出宋代诗人三千八百十二家，其中如尤袤为南宋四大家之首，但诗集全佚，厉氏从《后村诗话》、《梁溪遗稿》等书，辑得佚诗十余首，稍能展现尤诗



的面目。后来陆心源作《宋诗纪事补遗》，更增多三千余家，可见诗话笔记等书中保存的佚诗，数量惊人。

题跋

诗人题画、题扇、题壁、题跋的诗篇，为数不少，若非经用心采辑，散在十方。如于大成据米芾的书法真迹及丛帖书画中的诗篇，采补入岳珂所辑的《宝晋英光集》，例如《吴江舟中诗》、《多景楼》诗、《虹县》诗等，皆在集外。跋文则如许衡《题米老真迹》诗，不在《白云先生文集》内，方孝孺《题米老真迹》诗，也不在《逊志斋集》中，均可搜辑。

类书

唐宋人的类书中，引用不少前人的诗篇，若分别辑出，归类整理，一定大有可观。如《旧唐书·艺文志》说应璩诗有十卷，今已全佚，幸《初学记》引有杂诗一首。又如荀勖诗有三卷，今亦全佚，《艺文类聚》存《从武帝华林园宴》诗一首，作者姓名已佚，幸《初学记》亦引此诗作荀勖，尚存吉光片羽。孙望据类书及金石志跋等辑唐佚诗数百首为《全唐诗补佚》，童养年亦据类书岩铭府志等引唐诗，辑为《全唐诗续补遗》，合印入《全唐诗外编》，可见类书及题画、方志中可辑者不少。

此外，如古籍注文所引，以及府志、古庙、碑石、器皿上都有大量佚诗遗存，如于大成据陈乃乾《安徽通志·金石古物考稿》载安徽潜山县有石刻为王安石《题石牛洞》六言诗：“水无心而宛转，山有色而环围。穷幽深而不尽，坐石上以忘归。”为本集所不载。又如《考古学报》1980年一期上载长沙铜官镇湘江边唐代官窑废址下，挖出两千多个残破的酒壶，壶上面题有一首唐诗的共有五十四首，这五十四首诗中除韦承庆的《南行别弟》诗可与《文苑英华》查对外，其余的诗都不见于《万首唐人绝句》。这些佚诗写得不错：“我有方寸心，无人堪共说。遣风吹散云，言向天边月。”在敦煌残卷伯三六一九号载佚诗“我有方寸心”句，仍不知谁作。取来与李约《赠韦征君》诗“我有心中事，不向韦三说。秋夜洛阳城，明月照张

八。”相比较，此佚诗更胜一筹。其他如：“圣水出温泉，新阳万里传。常居安乐国，多报未来缘。”“客人莫直入，直入主人嗔。扣门三五下，自有出来人。”“嗔”本误作“宴”，项楚以为是“厌”字，取这诗与敦煌本王梵志诗“主人相屈至，客莫先入门。若是尊人处，临时自打门。”内容十分相似，但更口语化。“君生我未生，我生君已老。君恨我生迟，我恨君生早。”与慕容垂《冢上答唐太宗》：“我昔胜君昔，君今胜吾今。”更回环有味。凡此皆可作地毯式的彻底清查。

三、诗篇作者的真伪鉴别

成千累万的诗人与作品，使我们这个爱诗的民族，有着傲视世界的辉煌成绩，然而由于诗集数量的庞杂、流传年代的长久、编刻者的疏忽，再加上后人有意的仿古作伪，有时使同一首诗有两位“作者”，一篇久已失传的作品，后代又有人附会流传，于是“作者”的真伪起了疑问，“作品”的真伪也成了问题。学者如果利用这些伪诗作材料，立论就会歪曲，所以如何利用辨伪的法则，使作者检回其所写的作品，使作品鉴定其真贗，是一项需要费心去寻究的工作。

“作者”有问题的，例如有一首《江南曲》：“长乐花枝雨点销，江城日暮好相邀。春楼不闭葳蕤锁，绿水回通宛转桥。”《全唐诗》把它列入韩翃诗，又列入李益诗，作者的问题悬而不决，其实韩翃与李益的诗集，今日都没有宋本可以查考，目前所见这两家诗集较早的刊本，都是明代陈警所编的《唐百家诗集》，该集认定这首《江南曲》是韩翃作的，清初的钱谦益编《全唐诗稿本》，始辑入李益集。再考宋刻本《乐府诗集》卷二十六曾选载本诗，注明作者是韩翃。李益则别收《江南曲》“嫁得瞿塘贾”五绝一首，据此则宋代、明代的版本都将“长乐花枝”一首定为韩翃作，应该是对的，《全唐诗》以为是李益，并没有可信的根据。

又如孙洙《唐诗三百首》载杜秋娘的《金缕衣》诗：“劝君莫惜金缕



衣，劝君惜取少年时。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！”这首诗在宋刻本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卷八十二作者标为“李锜”，其实本诗始见于唐代韦毅的《才调集》卷二，题目是“杂调”，作者是“无名氏”，唐人已不知道作者是谁了，而杜牧的《樊川集》卷二有“杜秋娘诗”，诗中只说杜秋娘“唱”金缕衣，句下杜牧自注云“李锜长唱此辞”，只说“唱”，并没有说“作”。可见宋人郭茂倩说是李锜作，清人孙洙说是杜秋娘作，都是不对的。

“作品”有问题的，如《全唐诗话》载韩愈的《贻贾岛》诗：“孟郊死葬北邙山，日月星辰顿觉闲。天恐文章中断绝，再生贾岛在人间。”因为孟郊死于公元814年，陆侃如的《中国诗史》据此认定韩愈与贾岛相识，是在孟郊死后，约在贾岛四十岁左右。其实韩贾相识在元和六年春天（公元811年），有韩愈《送无本师归范阳》诗可证，当时孟郊还健在，诗中所写孟郊死后再识贾岛，完全荒诞无稽，因此知道这首《贻贾岛》诗是伪造的。

四、笺注训释的汇集订补

许多诗篇或诗集，各代皆不乏为它作注作笺的学者。也有不少号称三家注、九家注、百家注，乃至千家注的本子。这些注释，或出自亲手翻检，或辑自前人各家，但到了近人作注，大抵重复贩抄，纵使有些新添的增注，也混在一堆旧注里，显不出崭新的创见。再这样下去，必然使精力的浪费长期地延续，也未必能有精当的注本。所以对于旧有的注解，应重加查考，做一番汇集订补的工作。

旧注的缺点约有三项：

收辑不齐

像柳宗元的诗文，宋人辑注，已号称五百家，但一味夸大“采摭之富”，所说收辑“家数”多少，经不起一一查验。

误者不订

如冯浩第一次注李商隐诗，抄用许多旧注，结果错误百出，后来一一

查考重注，才较为可信，可见旧注中有不少是错的。

阙者不补

旧注往往在读者懂的地方，注解愈积愈多，注得太详细，读者不懂的地方，注得太简略，大凡诗的“艰处奥处”，一直是阙略着的。

所以就“注释”而言，应将每一本诗集作一次“结账式的整理”，否则注家虽多，永远陈陈相因，无法使后代学者知道误在哪里？阙在哪里？哪些问题未解决？哪些疑难已克服？以致书局须翻印许多实质上因袭重复的资料，研究者又须翻阅许多因袭重复的书籍，造成物力人力的浪掷。

要作“结账式的整理”，须先作繁赜的汇注，汇集各家的训诂注释，依年代排列先后，作成长编，再加考订慎择，写成精要的读本，编撰时一面披沙拣金，一面订讹补阙，将前人的成绩作一整理与总结，使后人确知日后努力的起程与目标，这工作极繁重也极有贡献。像钱仲联作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》，收集了十种版本较好的韩集，一一寓目校勘，又博采旧注论评达二百十一家，无论校异文、笺本事、解训诂、集诗评、订讹辨伪、系年编次，均达第一流的水准，在旧有的笺注集释一类书籍里，它是一个杰出而成功的典范。

今后要研究某家的诗，项目还可比钱书扩大，可分为校勘、旧注、补注、订讹、音释、解义、集评、分析欣赏八方面，逐项汇集旧说、订补旧说，算清“总账”。其中订讹一项，应依考据的法则，而不是单凭某权威者的意见。分析欣赏一项，应以具体的分析为主，而不是仍走抽象含混的传统批评的路子。

五、诗律音响的详密分析

音乐性是诗的特质之一。古典诗的音乐性，从具体而精略的方面说，就是声韵与格律；从抽象而细腻的方面说，就是声情关系的协合。自从诗与乐分途以后，目前在这方面深入探讨的工作，还待加强。



就诗律方面说，好像研究的人很多，大抵只研究到近体诗的“定式”与“拗救”，就算完成。其实古体诗中，可研究的地方仍不少，如五古的格律变化就捉摸不定，自清代赵秋谷所传的《声调谱》，理出了五古格律的头绪；董文涣的《声调四谱图说》，又分正拗各类，尤为详密；至王力写《汉语诗律学》，又分五古为“新式”及“仿古”两种：王维、孟浩然的五古属于前者，所作都有一种规律；李白、杜甫的五古属于后者，所作不受规则的束缚。新式的发展在前，仿古的兴起在后，新式的后来成为五古的正宗，天下慕响，大抵以“仄仄仄平仄”“仄仄平平平”“平平仄平仄”“平平平仄平”为格式的正则，除第一字平仄不论外，其余却有着规矩。仿古的五古，杜甫以后，作手不多（由是可知为什么李白说复古，而杜甫就那样地为李白倾倒，原来杜甫追效李白的仿古格律，已成为当时诗人群中的少数派，趣味相投、知音难觅，也是其中的关键之一吧？）王力这种分时代、分派别的研究，使五古格律的研究又跨进了一大步。

要研究诗的格律，取材举例，极为重要，赵秋谷于每体只采一两首为例，选择过略，例外必然很多，所谓“一法不足以概诗，一诗不足以尽法”，至董文涣则每体选二十余首，仍不免有“强古就我”的可能。王力虽极尽条分缕析的能事，但取例能否该括全面性，仍值得怀疑，因为那工作恐怕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可胜任的。

在作全面性的诗律研究之前，像王轩那样，研究沈约的四声八病，就逐句分析沈约的诗；像简明勇那样，研究杜甫的七律是否“四声递用”，就彻底分析杜甫每一首七律出句的末一句，有无“上尾”的情形。这种看来笨重、而却最为彻底的分析研究是有必要的，需要有“傻人”去做。由这些诗人个案的研究、诗律细节的研究，再推衍为断代的研究，再推广至全面性的研究，必要时更可以借助于电脑来处理，才能将所有的格律或例外一齐归纳统计出来。

至于诗在“声情谐合”方面的研究，前人偶尔提及，拙文《谈诗的音

响》(见《中国诗学·设计篇》),曾作了假设性的试探,若想再深入探勘,将牵连字根语根的研讨,并与音乐、古音学、训诂学、语言学等有着密切的关联,其中天地极宽,似乎还是一片前人未曾垦拓的原野。

六、诗论体系的擘析归纳

在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创建过程中,能自成完整的体系,像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或钟嵘《诗品》那样的著作,非常少见。而零星地讨论诗学理论的诗话,从宋代开始,却十分盛行。

由于诗话可以逐条札记,随得随写,无论纪事或评诗,都可各凭主观,不像史评、史论那般严肃认真,这是诗话兴盛的原因,也是诗话浮滥的原因。章实斋曾批评诗话说:“以不能名家之学,入趋风好名之习,挟人尽可能之笔,著惟意所欲之言。”章氏的批评虽不错,但在“人尽可能”的情形下,名家与低手各有著述,良莠虽杂处,其中自亦包括具有真知灼见的诗论。

这些散见各书的诗论,今日除可供校勘、辑佚、辨伪、系年、笺注等考据的用途外,更可以作为文学批评史、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资料。吾人首须访求各种诗话,作成叙录,再汇集各种诗话笺评,加以分类整理,使其条理化、体系化。台静农曾将何文焕、丁福保所编的《历代诗话》等书,再加上陈绎曾、赵翼、翁方纲的诗话共一百零一种,编成《百种诗话类编》,这种工作使散漫而缺乏伦次的诗话有了纲目体系,学者称便。可惜所收的诗话不多,目前台湾已印出的诗话,据笔者在本书《研究中国古典诗的重要书目》中的统计,尚有一百八十六种可以作成绩编,至于台湾未翻印的诗话,更是何啻倍蓰?

汇集这些诗话及笺评,可以分下列四类收辑:

作家为主的——分为批评某一诗人的,或比较两位以上诗人的。

作法为主的——分别就造意、结构、音响、修辞、神韵等门类收辑,建立传统的诗论。